

苏轼对管仲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熊泽文, 章晓琴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 乐山 614004)

摘要:苏轼在继承古代军事理论思想,特别是管子的军事思想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强兵”、“先发后罢”的军事理论。苏轼充分发展了管子兵民相溶的军事理论,对于巩固边防、稳定社会秩序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苏轼;管子;军事思想;源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11)10-0015-05

管仲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家、经济家之一,相齐四十年,辅佐齐桓公改革内政,振兴经济,富国强兵,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对后世有着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苏轼父子三人对管仲非常关注,父子三人都写了《管仲论》,对管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三苏在论管仲中有许多共同点,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管仲的功绩,从政治才能、军事思想、经济方针和处世哲学各个方面都给予管仲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他的不足,特别是指责管仲的不拘小节“不知礼”以及临终不能举贤自代,造成了齐国的大乱。三苏对管仲的评价各有偏重,各具特色,苏轼的评价是最全面中肯的。苏轼在十几篇文章中论及到管子,特别是对管子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深入阐述。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管子军事思想的继承,苏轼在管子军事思想上结合宋代社会现实加以丰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强兵”、“寓兵于民”、“先发后罢”的军事理论思想。

管仲所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周王朝内各诸侯国纷争不断,形成了两派:一派是郑、齐、

鲁,一派是宋、卫。此时,边境的各族也都发展起来。北方的狄人开始南下,成为中原各国的严重威胁。西方的戎人也开始东进,戎国经常侵犯鲁国和曹国,北戎又侵犯郑国,山戎又进攻燕国,伊洛之戎又进攻周王室。而南方的蛮人也跃跃欲试,想要北上,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各诸侯国都在谋求生存发展,齐桓公时以管仲为相,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于是称霸诸侯。苏轼生活在宋王朝仁、英、神、哲宗时期,这是一个“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的时期,北宋建立之初,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特别是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就已经很强大了。公元979年和986年宋军两度北征失败后,宋王朝对辽朝采取了守势。1004年辽圣祖大举攻宋,宋真宗却在取胜的有利形势下,同辽朝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宋王朝从此每年向辽朝输银纳币,有时甚

至不得不割地求和。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也是宋王朝的严重威胁。宋太宗时党项人占据夏州(今陕西横山县),攻取灵州(今宁夏灵武)和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不断扩大地盘、发展实力。1038年元昊建立夏国后,开始大举攻宋,从此宋王朝西部边境烽火连年。仁宗时,对西夏三战均以宋军的惨败而告终。面对夏朝和辽的咄咄攻势,宋王朝统治者不得不对其“赐”币请和,以维持边境地区的安宁。作为政治家的苏轼,面对外患内忧,提出了改革时弊,富国强兵,先发后罢的军事主张。

下面就苏轼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特别是管子军事理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行一些探讨。

一、富国强兵的战略思想

在春秋战国这个诸侯纷争的时代里,国家要强盛,要在诸侯中处于强势地位,就必须建设强大有力的军队,加强军事力量,强兵甚至成为决定国之生死存亡的先决条件。《管子》认为国家的威望不是凭空就能建立起来的,而必须依靠强大的军队才能在战争中取胜。管子认为,军事是尊主安国的必要手段。《参患》说:“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1160]《七法》曰:“不能强其兵,而能胜敌国者,未之有也。”^[1128]那么,如何“强其兵”呢?管子认为,要实现强兵的目标,首先在于富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七法》中曰:“国贫用不足,则兵弱士不厉;兵弱士不厉,则战不胜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1129]

管子认为,要养好军队,就必须积聚财富,只有国富才能兵强,富国富民是强兵的根本。所以,管子很重视发展经济,积累财富。《重令》中云:“仓廩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1181]而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是否发达,粮食是否充足,《权修》中云“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117]。《治国》中云:“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11261]只有富国才可以强兵,而要富国。就必须抓好农业生产,抓好农业生产,首要问题就是必须加强粮食生产,因此,管子在《治国》中云:“粟者,王之本也,人主之大务。”^[11263]也只有国富民富,士兵才能衣食充足,军队才会有士气,才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轻重甲》中云:“渔然击鼓,士忿怒,给然击金,士帅然。策桐鼓从之,舆死扶伤,争进而无止。口满用,手满钱,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禄重赏之所使也。”^[11264]《管子》将农业视为国家的根基,将粮食生产看作国家的命脉,看成富国强兵的根本。

苏轼在《进策·策略》中指出:“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

无可忧之形,此其未测者也。”^[1232]造成这种表面“治平”而实际危机四伏的“可忧之势”的原因主要就是朝廷为了解决无财缺财的情况而加大了对百姓的征收盘剥。朝廷一方面想在西夏、契丹二虏扰边入侵情况下求得苟安和平,每年便送之以大量的财物以满足其无厌之欲;另一方面是朝廷大兴宫室祷祠,君臣宴安享乐,花销巨大;再一方面是军费开支庞大。这几方面都造成了朝廷无财缺财。而要解决这一窘景,就只有在百姓身上加大赋税的征收。赋税增加,百姓的日子就难过,心中自然是十分不满。苏轼说,虽然还没有出现“水旱盗贼人民流离之祸”,但天下百姓已是“咨嗟怨愤,常苦不安其生”了。而事实上,百姓并非只是像苏轼说的那样“咨嗟怨愤”而已,尽管宋王朝建国近百年来,还未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反抗,但因朝廷官府的苛捐杂税增加而导致人民走投无路,最终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事不在少数。正是由于赋税的加重而直接间接造成了国家社会不安定的严重局面。要改变这种状况,苏轼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有几个方面:

第一,节用蓄财。苏轼在《策别厚货财一》中明确提出“省费用”的主张,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治理,苏轼则指出有三种情况:“夫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足用而有余。是以九年之蓄,常闲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灾,地不能使之贫,四夷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一时之计也。至于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2359-360]苏轼在这段话中明确地表明,为国者治理国家的经济,最佳的治理是平时注意节约,通过节用积蓄财富,一旦国家遭受水旱之灾,或外敌内乱的战乱时期,国家便能自己解财用上的不足,无需去惊扰百姓。这是万世之计。而另一种治理则是量入为出,收入多少用多少,这种治理只能适合国家处于平静安宁的状况,如果一旦有急,便免不了加重对百姓征收赋税,所以这仅仅是很一般的一时之计。至于那种量出为入的治理则是最“无谋”的治理,用度花销越不够,就越加重对百姓的征收盘剥。在国家平安无事之时,却把那些用于治理衰世的所有征收办法使尽了,如果国家一旦有急,那朝廷就无计可施了。这就是不节用的不终月之计。

第二,改革军制。苏轼在《策别厚货财二》中提出了重定军制的主张,他说:“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

二、改革兵制寓兵于民

三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蜀,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2362]。这几十万军队每年的费用,全靠朝廷供给。这些提供给几十万大军的财物又要靠大量的人力车船从全国各地运到京城来,这又是一笔大的花销。尽管朝廷加紧征收了赋税,但由于围绕这几十万军队的花费实在是巨大,所以朝廷的其他机构的费用仍得不到足额保证。另一方面,朝廷又要派京城禁兵去戍守郡县,三年一次换防,派去的途中要花销,回来的途中也要花销,费用很大。苏轼说:“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2362]这三年一迁,往返数千里,尽管派去的与回来的仅仅是京城禁兵的一部份,但这一去一来,其花费差不多相当于几十万军队出征的花销。

针对宋王朝的军制造成巨大花费这一状况,苏轼提出改进军制从而节约花销的主张。他指出,一是加强对各地地方“土兵”的训练,增强其军事素质和本领,由他们来代替从京城来的禁兵所担任的戍守郡县的任务,这样就可以节省因京城禁兵三年一迁的换防所造成的巨大花费。二是逐渐减少京城的禁兵,只要够“天子扈从捍城”就行了。这样一来,“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已过半矣”^[2363]。

第三,建立一支强大有力的军队,不向辽和西夏纳贡求和。“澶渊之盟”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的关南誓书,这是对宋辽两国议定“澶渊之盟”的继续,宋对辽岁币增加到银20万两,绢30万匹。1044年(庆历四年)宋与西夏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议”。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称北宋为所谓的“兄长”。宋封元昊为夏国主,宋夏名义上是君臣关系,宋每年以“赏赐”名义给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

和议对宋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真宗时期,一直是收入超过支出,仁宗初期和中期也是如此,不过此后就开始恶化。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收入为1.16亿缗,总支出则达1.31亿缗,超支1500多万缗。这种情况下再支付大量的岁币,就不能说是轻松自在了。到宋神宗即位时期,国家财政已无余钱,国家库场已经告罄,国家经济年年赤字,宋神宗两手空空,甚至不得不给他老爸“简葬”。由于岁币是年年支付,国家承平丰饶时没什么感觉,一旦财政紧张,就会变成勒在脖子上的绞索。

怎样来才能摆脱外辱呢?只有强兵,国家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会受外辱。苏轼充分继承了管子的强兵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强兵策略。

早在春秋时代,管仲就曾主张并实行“四民分业”定居,“作内政而寄军令”。管仲把居民组织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分业定居便于实行军事编制和训练。具体做法是“叁其国而伍其鄙”,即把国都之内的居民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不事兵役,其余十五乡各分为五乡,由国君与国子、高子率领。在参其国的基础上,又按照大国三军的国制,设立三军。十五士乡的居民组织分为轨、里、连、乡四个层次。居民组织的“轨”,同时又是军事组的“伍”,“里”同时是军事组织的“小戎”,“连”于军为“卒”,“乡”则为“旅”。这样,基层军事组织的战士,都是“世同居,少同游”的邻里之人,战阵中彼此能较好地联系,配合,也便于指挥,“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管子的这一措施,开后世寓兵于民的先河。

同时,管子在军政一体的基础上强调政教与军教相结合。管仲将军事组织寓于居民组织中,从而形成了军政统一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各级行政长官同时又是各级军事长官,国君就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并且要求平时加强训练,增强战斗力。齐国正是利用管子的治国治军之法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

苏轼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军事思想,进行了兵制改革。苏轼在兵制方面的改革思想主要是反对兵与民绝对相分,变革终身兵役制为十年制兵役,创建民兵和加强地方军事。

(一)寓兵于民军民合一

苏轼认为兵与民绝对相分是兵制弊端要害所在,“兵民既分,兵不得复为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2366]便出现了大量的老兵、弱兵。苏轼主张“兵出于农”,兵农合一。他认为,自募兵制推行以后,应募为兵者即“书于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于终身”^[2367]。既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又耗费了国家钱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莫过于“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同时,他还主张募民屯田,把“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迁徙到空闲之地,另外招募身体强壮者在边境屯田;随着屯田士兵数量的增加,戍守边境的军队就可以逐渐地减少,数年之后就会发生变化,“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兵农合一之目的即可达到。

苏轼不仅提出了改革时弊、增强国防力量的军事思想,而且在为官从政期间,一直努力实践着他的主张。元丰元年(1078),苏轼知徐州(今江苏徐州),徐州北路盗贼猖獗,致使徐州的生铁产品流通不畅,大量积压,冶铁户面临停产危机。苏轼向神宗皇帝上书,提出

为了治理徐州的军事措施。第一,建立一支保证生铁产品流通的武装,由冶铁大户自己出钱请人保护自己。第二,加强徐州兵力。第三,加强训练,严明军纪。苏轼在徐州期间,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二)行十年兵役制,加强军队战斗力

战争的主体是兵卒,兵卒的素质与战斗力如何是关乎战争成败的关键要素。因此管子十分重视选卒练士工作,认为选卒是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从社会中选拔出来的兵卒,经过严格而艰苦的军事训练,才能组成一支具有作战实力的军队。

苏轼所主张的十年兵役制,个人“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过四十余年之间,勇锐强力之气,足以犯坚冒刃者,不过二十余年”^[236],而是时应募为兵者,终生以当兵为职业,四十岁以后,必然成为“老弱之卒”,丧失战斗力。因此,他主张对士兵的年龄加以限制,现役士兵五十岁以上“愿复为民者,宜听”,以后征募,三十岁以下者方能为兵,服役以十年为限,十年后复为平民。苏轼注意到士兵的年龄、体力以及退役后的安排等问题,其主张不仅新颖、深刻,而且具有实用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

(三)削减禁军,加强地方军

宋王朝沿袭唐中期以后兴起的募兵制,国家挑选人材,提供经费,组织、装备军队,使之成为职业的雇佣军。这一制度对提高军队素质,加强中央集权,曾经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然在腐败政治的侵蚀下,宋王朝募兵制度逐渐衍生出诸多弊端。其一,军队数量与军费用急剧增加。宋太祖开宝年间有军队 37 万余,宋太宗时增至 66 万余,真宗时达到 91 万余,仁宗庆历年间更达 125 万余,比太祖时增加了三倍,养兵之费高达 4800 余万贯,比太祖时增加了九倍多。其二,禁军骄惰成风,冗兵日增,战斗力削弱。按宋王朝军制规定“兵至六十一始免”,然当其应退役之际,“犹不即许也”,冗兵日多,加以军中“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胜数”,故战斗力受到极大削弱。在对辽、夏的战争中,往往“战则先奔”,溃不成军。其三,士兵平时缺乏训练,武艺生疏,难当战阵。史载:“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屯戍边境的骑兵,或“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或教射之际“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以坠地”,甚至“有不能被甲上马者”。

针对募兵制日渐滋生的诸多弊端,苏轼不仅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而且具体地提出了解决的方法。苏轼在《策别厚货财二》中提出了重定军制的主张,他说:“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辅者,以数十万计。”而这几十万军队每年的费用,全靠朝廷供给。而“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蜀”,这些提供给几十万大军的

财物又要靠大量的人力车船从全国各地运到京城来,这又是一笔大的花销。尽管朝廷加紧征收了赋税,但由于围绕这几十万军队的花费实在是巨大,所以朝廷的其他机构的费用仍得不到足额保证。另一方面,朝廷又要派京城禁兵去戍守郡县,三年一次换防,派去的途中要花销,回来的途中也要花销,费用很大。苏轼说:“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这三年一迁,往返数千里,尽管派去的与回来的仅仅是京城禁兵的一部份,但这一去一来,其花费差不多相当于几十万军队出征的花销。针对宋王朝的军制造成巨大花费这一状况,苏轼提出改进军制从而节约花销的主张。他指出,一是加强对各地地方“土兵”的训练,增强其军事素质和本领,由他们来代替从京城来的禁兵所担任的戍守郡县的任务,这样就可以节省因京城禁兵三年一迁的换防所造成的巨大花费。二是逐渐减少京城的禁兵,只要够“天子扈从捍城”就行了。这样一来,“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已过半矣。”

通过改革节省开支,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这样才能主动出击,拒敌于千里之外,才能保国家之安危。

三、主动出击 先发后罢

春秋时期天下纷争,据史书记载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会盟朝聘四百五十余次。每打完一次仗就要坐下来谈判,结盟。当时管仲提出将“尊王攘夷”定为国策,即尊周天子天下共主之位,联合中原各国,出兵攻打戎狄。联合八国军队,攻打进楚国,迫使楚国向周天子进贡,并加入盟会。这体现了管子主动出击,掌握主动,先发后罢,打赢再谈的军事思想。

管子主张用兵打仗要把握时机,利用形势,精于筹算,争取主动。管子在《七法》中一再强调:“为兵之数……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130]所谓“明于机数”,包含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战机的把握问题,二是指情况的筹算问题。管子认为战争就要能创造出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取得作战的主动权。

管子高度重视战争的主动性,要善于把握战机,因时而动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总原则。管子在《霸言》中道:“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243]战争是否打,如何打,都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当战则战,不当战则止。在这方面只能“辅时”,而不能“违时”。正确的做法是力求“当时”、“精时”,这样,就能在战争中以较小的牺牲赢取最大的胜利。至于“当时”、“精时”的要义,在于准备条件,捕捉战机,一旦战机成熟,就应迅速出击,一战而胜。

北宋时,面对西夏、契丹等国的入侵,苏轼主张主动出击、先发后罢,用反侵略战争消灭侵略战争,苏轼

在《应诏集》策断二十三其中道：“国家所以奉西北二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苏轼建议朝廷把握住战争的主动权，即做到有发有罢，先发而后罢。“天下之权，在于朝廷，伐之足以威，舍之则是以为恩，臣故日先发而后罢，则权在我矣。”^{[2]373}他还强调要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际，致民田野以讲武。教之进退坐作之方，使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惧。”他分析，在宋朝过去与敌国的较量中，总是被动吃亏，原因就在于没有取得主动，往往是被动接受对方的条件，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他举宝元（1038—1039）、庆历（1041—1048）年间“河西之役”为例：“其始也，不得已而后战；其终也，逆其意而与之和，又从而厚赂之，惟恐其一日复战也。如此，则贼常欲战而我常欲和。贼非能常战也，特持其欲战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势，屡用而屡得志。是以中国之大，而权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则莫若使权在中国。欲权之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战，而后天下之权，有所归矣。”他对唐太宗“争先而处强”的战略十分认同，道理就在于：“使人备己则权在我，而使己备人则权在人”，^{[2]372}只有先发制人，才能牢牢掌握主动权。

同时苏轼还根据北宋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他在《策断》中道：“夫西戎、北胡，皆为中国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故二者，皆所以为忧。而臣以为兵之所加，宜先于西。故先论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长，地广而备多，备多而力

分，小国聚而大国分，则强弱之势，将有所反。”西戎之于中国，可谓小国矣。——我大而敌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吴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徂陈欤？夫御戎之术，不可以逆知其详，而其大略，臣未见有过此者也。”^{[2]372-373}苏轼认为大国的长处就在于人力物力雄厚，可以分兵数出；小国人力物力薄弱，不能分兵多次应付。他认为要战胜西夏，就应分兵骚扰，轮番作战，弄得西夏疲于奔命。过去对西夏用兵不利，就在于没有用己之长，攻敌之短，苏轼对大小强弱辩证关系的这一分析，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颇有见地的。

苏轼对西夏和契丹作了比较，认为契丹对宋王朝的威胁比西夏大；但“兵之所加，宜先于西”。因为自古以来要击败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都必须通西域；而当时西域不通，就是因为西夏成了障碍。西夏比起宋王朝来，自然很小；但苏轼警告说，“大有所短，小有所长”，弄得不好，小的将战胜大的。大国地广而备多，备多而力分，“小国聚而大国分”，小国力量集中，大国力量分散，强弱之势就可能走向反面。

对于契丹，北宋统治者更是畏敌如虎，“以为不可得而图之”。苏轼不以为然，认为契丹“有可乘之势三”：一是契丹的朝廷百官，有“中国士大夫交错于间”，其中也有“贤俊慷慨不屈之士”，他们受契丹凌辱，“有惋愤郁结而思变者”。二是沦陷区人民，被契丹“厚敛而役使”，皆有“内附之心”。三是契丹在幽燕之地“僭立四郡，分置守宰，仓廩府库，莫不具备。有一旦之急，适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华夷杂居，易以生变”。根据以上情况，苏轼认为是能够战胜契丹，收复失地的。

苏轼在任地方长官期间所推行的“严军政”、“教战守”、“训兵旅”等措施，对于巩固边防、稳定社会秩序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苏轼军事思想是对中国古代军事理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管子军事理论思想。苏轼将中国军事理论思想进行了完善和补充，在中国军事理论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参考文献：

[1]管子校正[M]//戴望. 诸子集成. 北京：中华书局，1954.

[2]曾枣庄，苏大刚. 三苏全书：第十四册[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